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实辨析】	对朱甲西先生《我和彭德怀的一段渊源》一文的质疑	陈永迪
【知青岁月】	我们与当年的传教士	秦 晖
【以史为鉴】	“文革”教训是亿金难买的	季羨林
【痛定思痛】	我做了十年的精神奴隶	巴 金
【不堪回首】	“文革”中的苦难史（之一）	韩美林·冯骥才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实辨析】

对朱甲西先生《我和彭德怀的一段渊源》一文的质疑

• 陈永迪 •

尊敬的编辑：

贵刊《华夏文摘增刊第一〇八九期》刊登朱甲西先生的文章《我和彭德怀的一段渊源：66年在大三线》（见本刊zk9708a——编注），有关彭德怀从成都抓到北京的过程及相关内容严重失实。

笔者当年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以下简称北地东方红），亲历抓彭总的全过程，并在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12期发表《我参与的揪彭德怀行动》一文，对“揪彭行动”有详细的描述。对于揪彭行动，阎长贵和王大宾在《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见本刊zk1407d——编注）一文中，表达了当年参与揪彭学生共同的忏悔心情：“在迫害彭总的‘文革’狂潮里，我们都是一粒棋子，我们都有错误，我们向彭总的英灵致歉！”

把彭总从四川揪回北京的过程在很多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文章中，都有一致说法。现在，冒出一个朱甲西先生，编造荒诞离奇情节，宣称他才是彭总的真正保护者。对此，笔者以亲历者的身份对朱文的谎言进行批驳，以下对朱甲西先生的文章简称“朱文”。

朱文：“我12月23日赶到成都永兴巷，正赶上四川大学的红卫兵要揪斗彭，景希珍和警卫战士护住彭不让红卫兵抓他上车。”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真相，笔者作为亲历者对事件简要回顾如下：12月17日王大宾在重庆接到中央文革揪彭指示，18立即赶到成都听取成都联络站同学汇报，此后几天到永兴巷见了彭总并和他交谈，认为彭总拥护文化大革命，反对刘少奇，于是不同意揪彭，还派了

两人回京向中央汇报不揪彭的理由。12月22日北地东方红总部派人来向王大宾传达周总理指示：红卫兵与成都军区一起安全护送彭回京。当天下午，王大宾派谭保华到成都军区联系，成都军区有关负责人回话：“军区已经接到周总理指示：‘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回北京’”。23日凌晨，发现彭总已被北航红旗的人抓到成都地质学院，北地东方红仗着人多势众赶到成都地院从北航红卫兵的手里接管彭总，将彭总送到四川省地质局局长的办公室休息，当时天寒地冻我们专门给彭总的房间端来火盆取暖。

从23日至25日下午5点之前，这段时间彭总一直没有离开过省地质局，25日5点彭总乘34次特快离开成都回京，笔者参与全过程。23日彭总到省地质局后，成都军区立即派部队在办公楼警卫，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入。其间川大826红卫兵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也不可能见到，因为他们对彭总在何处一无所知。顺便提一句，也没有见到朱甲西先生的影子，当时守在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警卫参谋景希珍一人。

朱甲西先生冒充彭总的保护者，朱文：“我看双方虽然紧张对峙，但学生们并不是义愤填膺，好多人拥挤着要看彭德怀是个什么样子；我发现他们826兵团的头头江海云在场，我向她说批斗彭德怀可以，我要向中央军委请示，批准了你们将人带走，我们的医生、护士、警卫要跟了去，你们组织还得给我们打张条子，健康的人交给你们，你们必须安全的送回来。她竟然被唬住了，几个人商量一阵就带领红卫兵撤走了。”

23日彭总根本不在永兴巷。朱先生是和风车作战的唐吉柯德式的勇士，还谎称见到了江海云，依江海云的见识和造反风格，你哪儿有本事唬住她！

朱文：“第二天是24日，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领袖王大宾，拿着中央文革的批示，来到永兴巷三线指挥部，要抓彭回到北京批斗。”

我们来看看王大宾是怎样说的，阎长贵（求是杂志社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和王大宾写的文章（原载《同舟共进》2014年第07期）《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写道：“23日早晨天未全亮，派小车去彭总住地接人，才发现彭总几小时前被北航红旗的学生抓到成都地质学院去了。怎么办？大家议论，北航只派了几个人来，地院东方红在成都联络站有一百多人，人多势众，抢过来。王大宾和胡乐成立即去北航红旗驻成都联络站谈判，要他们交出彭总，共同和成都军区一起押送彭总回京。他们不同意，谈判一个多小时未果。此时，地院同学来人汇报说：找到彭总了，已经从成都地质学院接到地质局。王大宾和胡乐成立刻离开北航联络站。地院同学把彭总安排在四川地质局一个局长办公室里，精心守卫。”

如果朱甲西先生对以上佐证质疑：你的引证都是北地东方红一家之言，不可信！最有说服力的是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在彭德怀传记组《彭德怀全传》、景希珍《在彭总身边》、沈国凡《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等书中都有记载，以下是信的原文：

主席：

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你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北京。现在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你最后一次敬礼！祝你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彭总在信中明确说明他是22日晚先被北航红卫兵抓走，23日转北地红卫兵，27日被押解到北京。若朱文的说法成立，那就是彭总有分身术，同一个彭总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点，显然朱先生是谎言制造者。

朱甲西先生撒谎不止一处，朱文：“8月6日成都后宰门体育场，彭德怀第一次登台挨斗，柯柄松和我有幸站在他身后陪斗。”（成都没有“后宰门体育场”，成都市体育场在后子门）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是四川历史大事记最权威的书籍。查遍全书，根本没有1966年8月6日在市体育场批斗彭总的记载。各种版本的四川文革史、全国文革史，各种版本的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均未见记载。巧的是那一段时间笔者正在成都，如果真有对彭总的批斗会，大字报、小传单满天飞的成都早已传遍全城。对此不仅我一无所知，我的老师唐指导也闻所未闻。笔者高中时参加过成都市体委举办的无线电收发报培训班，唐指导是我的教练，他就住在后子门体育场东门的市体委宿舍内，唐指导还是志愿军60军的报务员，参加朝鲜战争后转业到成都市体委。那一段时间我常去唐指导家做客，如果在唐指导家门口批斗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作为志愿军复转军人的他一定会将此重大新闻告诉我，事实是一切都没有发生。

回顾历史，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井泉正在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5日毛主席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矛头对准李井泉的后台刘、邓。李井泉正在焦头烂额之际，成都各大专院校又掀起了反工作组高潮，“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市委”的大标语铺天盖地，李井泉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那有心思开什么批斗彭德怀的大会，朱甲西先生当“陪斗”英雄纯属子虚乌有。

朱文：“抗美援朝时期我是学生，1954年调干参军”，“文革结束后，我从我的档案袋中看到我被看作是彭德怀的小爪牙，上庐山被怀疑是传递密信。”，“反右倾结案时终于放过了我，没给任何处分，但把我调离中央军事机关下放到南昌320飞机制造厂去当车间主任”，“6年之后的1965年，彭德怀到成都任国务院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上任以后他想起了我，通过军委办公厅一纸调令，将我从南昌调到了成都。10月份我从南昌经北京到三线建委报到，先被分配到规划局任代理局长，1966年1月5日改任彭的技术秘书。”

三线建委是省、军级单位，局长相当于师级干部，只有老红军或老八路才有资格担任。朱甲西先生既没有扛过枪（参加建国前的革命战争），也没有跨过江（参加朝鲜战争），一个54年才参军的学生，档案中还记有“彭德怀小爪牙”的黑材料，不被打入冷宫已是万幸，何德何能从南昌飞机厂小小的车间主任（此级别在三线建委只能当办事员）连跳三级摇身一变成了“三线建委规划局代理局长”，后来又高就三机部部属国营大厂川西机器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可信度几何？

鉴于朱甲西先生的诚信严重缺失，我对朱文描写的其它情节以及他和彭总的交往、对话的真实性均表示怀疑，在此不一一批驳。

最后一点，在描写彭总文革时期的各种书籍中，没有一书记载彭总身边有一位秘书叫朱甲西。景希珍的《在彭总身边的日子》中记载，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秘书綦魁英、警卫景希珍、司机赵凤池。

朱甲西先生的身份非常可疑。

原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66届学生陈永迪
2017年9月14日星期四于成都

~~~~~

## 【知青岁月】

### 我们与当年的传教士

• 秦 晖 •

从1969年到1978年，我作为插队知青在广西田林县的壮族山寨生活了9年，可以说基本经历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的全过程。我们那里是地道的农村，不是“兵团”或农场，那里地处滇黔桂三省之交，我们县又是广西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稀的县，我们去的平塘公社离县城有两百里，走到通汽车的公路边也要60里。当时那里有的妇女一辈子连县城也没去过。

我们那里也算“老区”，虽然田林县1949年以前并没有共产党的活动，但她所属的百色地区当年曾发生过据说是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并由此出现过“右江苏维埃”，整个百色地区因此也属“革命老区”。那时常“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山（区）、穷（贫困县）”来概括中国的五类需要照顾的不发达地带。而这“老少边山穷”五样都占全了的地方，数来数去全国大概也就只有我们那里了。

#### ◇ 洋插队与土插队

然而就是在那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一百多年前居然曾有法国的传教士在这里传教。当年的“西林教案”，又曰“马神父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县（当时的西林县并非今天的西林县，那时该县大半辖境，包括县城在内，今天都属于田林）。此事成为法国参加英法联军侵华的口实，对“民族命运”的影响应该是众所周知了。那当然是一段国耻。

而那位被清朝县官处死的“马神父”，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是西方的“文化侵略者”，而在天主教的记载中是“殉道”的圣徒。后来搞了史学，我还真查过这事。当时清朝的上级官府说根本不知道这事，按清律，死刑是要报中央审批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更说是弄错了。袁伟时先生说这是桩“糊涂案”。

不过无论历史评价如何，就他们个人而言，平心而论，这些人在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经济利益可言的情况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而且不是到北京、广州那样的城市，而是到我们那个荒僻、贫困而又充满敌意和危险的滇黔桂边区“扎根农村”，乃至死在那里，也是出于信仰的力量。

把这些来华传播基督教并促成中国教会建立的人们与后来苏俄派来传播马列主义并促成了中共建立的马林、罗易等“国际使者”相比是很有意思的：前者扎根于穷乡僻壤，而后者游走于大都市；前者系政教分离下的教会所派，不像后者那样受本国政府派遣、深涉政治运作、在华也有更大的特权；前者的传教更没有后者那样成功、以致后者所传终成官方信仰而有了“政治正确”性，两者受到的褒贬也因而截然不同。

两者来华都是出于信仰——这信仰是否“正确”另当别论。都是未经当时中国政府（敌视西方的清政府和敌视苏俄的北洋政府）允许的违禁冒险，从事这样的活动，套用现在的语言，他们都需要有很强的“个人使命”感，而他们的“使命”又强烈地影响了我们以及他们的“民族命运”。

我们公社渭各大队所在的金堂村，古时原叫刘家坨，清末法国传教士在那里修建了教堂后，人们就改叫“经堂”，也就是现在的金堂村。我们插队那时的卫东（渭各在文革中的改名）大队部就设在那座教堂——哥特式尖顶已经没有了，但下面的门窗还都是西洋式的拱券。我曾在这个大队部住过一夜，记得当时墙外还保留有1951年大军进山剿匪时书写的大标语，是动员当地群众规劝参匪亲人出来投降的。

1970年代我到这里时已经20多年过去，这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小山村面貌如初。当地人说这里土匪出没不仅是解放初期，清代以来就是如此。当时我就想，我们田林县已经是广西的边远县份，我们平塘公社又是我们县的边远公社，而渭各这个大队，在我们公社也是最边远的大队之一。就在这样一个土匪出没的山旮旯里，这些法国人要待一辈子，真是难以想象。

后来我还得知，离金堂不远的另一个当年法国教堂所在地常井村还有个法国传教士墓地，不同时期来华的法国神父死后葬在那里有6人，其中4人至今留有碑文，这4人都是来华传教1至4年就死去，享年仅20—30岁之间。真是令人感慨。当然他们要在这里传播基督教的努力基本失败了，一百多年后我们那里并没有多少基督徒。可是我们插队时声称要防修反修扎根农村建设共产主义农村的想法，不也失败了吗？

#### ◇ 知青运动的世俗动机与信仰动机

要说后来我们这些知青，今天说起来也无非是两种调子：或者赞其“理想主义”，或者哀其历经磨难。但是这两者要比起那些传教士来恐怕都还差得远：我们绝大多数知青其实是不得已而“上山下乡”，而他们基本都是出于信仰，志愿来传播福音的；我们多数待两三年就走了——我插队9年已经是我们这批知青中坚持最久的，而他们很多都终生在穷乡僻壤献身于传教，不仅吃尽苦头甚至丢了性命的也不在少数。与他们相比，我们的经历其实太稀松平常了。

与关于领袖动机的争论类似，今天评价知青运动中官员和知青们的动机，也不外是两种说法：“世俗动机”说指文革动乱期没搞建设也废了大学，城里解决不了大批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升学问题，而这些被煽动起来革了两年命、造了两年反的“红卫兵”们在搞掉领袖不喜欢的“走资派”以后，也不再具有利用价值，必须尽快把他们遣散出城，以免他们继续“造反”添乱，于是把他们弄去“上山下乡”。

在经济上可以消除城里的失业危机，政治上又便于建立文革后的“新秩序”。而“意识形态动机”说则强调当局这样做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伟大理想，知青们也是相信“与工农相结合”的真理，为了“防修反修”的信念而“满怀豪情奔赴农村”的。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两种动机也都存在。但是相比较而言，显然我们的信仰动机不能与那些传教士相比。这不仅因为我们中的多数并非情愿，更重要的是：发动这场运动的当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把它当作一种惩罚，特别加之于他们不喜欢的人。

尤其是我们这些直接到农村的人更是如此：如果说当时到农场、到“生产建设兵团”还需要某些条件，被“打入另册”者还不配去，那么农村则是完全没有条件、谁都可以去，越是被打入另册者还越不得不去，而受宠者就可能不去的。所以林彪儿子搞的那个《571工程纪要》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话虽难听，当时却引起了很大震动。这就跟国外教会的传教运动完全不同，教会总不会专门把它不喜欢的“异端”分子派到穷乡僻壤去传教、把它当作对后者的一种惩罚吧？

其实这样的事也不仅发生在中国，苏联当时许多被宣传得令人“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事业，今天我们知道参与者绝大多数也非自愿。如著名的“共产主义志愿者建设工程”“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通航运河”和远东那个今天以生产苏霍伊飞机闻名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等等，其实都是劳改犯聚集、以苦役方式建设起来的“古拉格群岛”。

甚至就是过去脍炙人口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也并不那么浪漫，苏俄理论家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就坦率地讲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代自由劳动。

布哈林还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允许工人罢工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你还想为提高工资而罢工？反了你了！没工资白干你也得干，不干就叫你尝尝“专政”的厉害！所以这种“义务劳动”与今天从西方传入的志愿者、义工绝不是一回事，它可不是由着你发挥“理想”的！

我们也经历过类似的事，那时我们参加的不少水库、公路等“革命”工程也是以传统的徭役征发方式修建的，有时为赶工期，过年也不放人，号称在工地过“革命化的春节”。但是普通的农民民工还是大都逃跑回村了，没跑的除了我们少数知青，主要就是“地、富、反、坏”的“四类分子”民工。我们没跑是因为村里不是我们的家，而且我们多属于施工员、会计之类不用干重活的“临时白领”，在工地的生活比在村里轻松。而四类分子没跑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专政对象”，不敢跑。于是便只有这些最不配“革命”的人来过“革命化春节”了——就像苏联用劳改犯来建设“共青城”。

也不能说，那时就完全没有理想和信仰这种东西。今天对于“青春无悔”之类的高调我很不以为然，要说我应该是资格讲这种话的。当年我属于少数并非被强制动员、而是自己要求下乡的人，当时只有15周岁。在农村一待9年多，虽说并不是我非要“扎根”，总还是当时被看作“表现不错”的吧。在那里我入了团入了党，虽然并非大红人，但地、县一级的“先进会”我还是去过几次的。“粉碎四人帮”后“先进”恢复叫“劳模”了，我还在临离开之前当过一届县劳模。

我当年要求下乡，其实也有具体原因，那就是文革中我参加的“广西4.22”一派当时是失败者，遭到严厉镇压。尽管我作为文革时刚进初中的“新生”只是无名小卒，并未受到冲击，但“毕业分配”时两派的待遇是不同的。属于胜利一派的同学可能有招工名额（当然只是可能，由于我们学校掌权派占大多数，远超过很少的招工名额，所以也有不少下乡的）。我们这失败的一派则基本只能去下乡“插队”。我因为不到16岁，按规定不到“分配”年龄，应该继续读高中。

然而在临毕业的一年中几乎天天看到那派掌权者残酷批斗我们这派的同学，这种氛围使我觉得郁闷，也看不到再读缩短为两年的高中后会有什么更好的前途。加上我父母所在的教

育厅属于“斗批撤”单位，他们都被宣布作为“下放干部”要离开省城到另一个边远穷县安置。我如果继续念书，到时恐怕也要随父母转学到那里。那么与其到一个陌生地方再读两年最后还得作为县里知青去插队，还不如现在就作为省城知青去了，至少还可以和我的那些伙伴们在一起。我这样的动机应当说还是很寻常的。

我们那一派当时还有一些人是“武斗”——其实就是内战中战败被俘，被胜利者作为对“反革命”的惩罚，从俘虏营里直接被遣送下乡的。我后面要提到的高年级兄长陈念昆，在俘虏营关押一年，被“宽大”放出后曾经主动跑到当时他们南宁一中被安排的正式插队地，南宁专区的扶绥县，想试探能否在那里“正常”插队，结果当场就被当作“反革命逃亡”五花大绑抓回来，在南宁游斗示众，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掌权者宣布这种人不能“正常插队”，把他们发配到比扶绥边远贫穷得多的三省交界之地田林县。

当时随人发到县里的人事材料就写明他们犯有“反革命”前科，“念其是学生，免于刑事处分”，要求对他们加以看管“改造”。而我们四中在田林插队的老大哥刘少平，甚至被贬到这个“蛮荒之地”一年后掌权派还不放过他，又借“抓五一六”运动之名派人把他抓回南宁关押了一年，然后弄回田林继续“改造”。

这样的“上山下乡”有什么“青春无悔”可言？那是他们的选择吗？不是自己的选择还有什么悔不悔的？在金堂村面对那座教堂废墟，我想这些人与那些为了信仰而主动来传教的法国人更有天壤之别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即便是这些人也不是没有理想主义或信仰的推动。

□ 原载《秦川雁塔》微信号

~~~~~

【以史为鉴】

“文革”教训是亿金难买的

• 季羨林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没有，一点也没有。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有什么人说：“文革”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革”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革”并没有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革”，特别是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革”不了解，听讲“文革”，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革”，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宏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记得是在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革”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革’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类人，既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想起了他们的历史和现状。在封建社会里，士列在士农工商之首，一向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样的知识分子，我没有见到过。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我是见到过的。不说别的，专就当时的大学教授而言，薪俸优厚，社会地位高。他们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必然的。他们一般都颇为神气，所谓“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情况大大改变。国民党统治已到末日，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教授实际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还是披着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的。

刚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样，兴奋异常，觉得自己真是站起来了，自己获得了新生了。我们高兴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们觉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红艳似玫瑰，光辉如太阳。

但是，好景不长。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在“中盆”里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是污浊的东西，觉得身轻体健，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头。

可是后面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好像是有点喘不过气来。批判武训，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胡风，批判胡适，再加上肃反等等，马不停蹄，应接不暇。到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间，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我顺便说一句，当时还没有发明“喷气式”，批判会不像“文革”中那么“好看”——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里却逐渐升起了一片疑云：为什么人们的所作所为同在那前后发表的几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显得极不合拍呢？即使是这样，我对那一句最有名的话“是阳谋，不是阴谋”，并没有产生怀疑。

反右以后，仍然是马不停蹄，一个劲地搞运动，什么“拔白旗”等等。庐山会议以后，极“左”思想已经达到了顶点，却偏偏要来一个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识分子一样，尽管天天饿肠辘辘，连半点不满意的想法都没有，更不用说说怪话了。连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谁能说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呢？

1966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后连原北大公社的东语系一个教员都告诉我说，我本来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的。但是，我偏偏发了牛劲，自己跳了出来，终于得到了报应：被抄家，被打，被骂，被批斗，被关进了牛棚，差一点连命都赔上。我当时确曾自怨自艾过。但是现在我却有了另一个想法。“文革”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可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渐感到其中有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折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身上毛病不少，缺点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里呢？我当时认识不高，思考问题肤浅片面。我没有责怪任何人，连对发动这一场“革命”的人也毫无责怪之意。我只是一个劲地深挖自己的灵魂，用现在间或用的一个词儿来说，就是“原罪感”。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个词儿，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而已。

别的老知识分子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它表现在我身上却是很具体的。解放前，我认为一切政治都是肮脏的，决心不介入。我并不了解共产党，只是觉得国民党有点糟糕，非垮台不行。解放以后，我上面说到我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收获，其中心就是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肮脏的，共产党就不是。同时又觉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我自己却躲在万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业。我认为自己那一点“学问”，那一点知识，是非常可耻的，如果还算得上“学问”和知识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称自己为“摘桃派”，坐享胜利的果实。

那么，怎么办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发生一次抗日战争，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表现一下。我一定能奋力参战，连牺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我读了很多描绘抗日战争或革命战争的小说，对其中那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不怕牺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我自己发誓向他们学习。这些当然都是幻想，即使难免有点幼稚可笑，然而却是真诚的。这能够表现出我当时的精神状态。

谈到对领袖的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这位“领袖”，“九·一八”事件后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

到南京请愿时见过，他满口谎言，欺骗了我们。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他的诗句“看花愁近最高楼”，可以为证。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回国以后，仅仅隔了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相同，我们那种兴奋、愉快，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当时每年要举行两次游行庆祝，五一和十一，地点都在天安门。每次都是凌晨即起，从沙滩整队步行到东单一带的小胡同里等候，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10点整，大会开始。我们的队伍也要走过天安门前，接受领袖的检阅。当时三座门还没有拆掉。在三座门东边时，根本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一转过三座门，看到领袖了，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声。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我在上面简短地但是真诚地讲了我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一滴水中可以见大海，一粒沙中可以见宇宙。别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同我差不多，至少是大同而小异。这充分证明了，中国老知识分子，年轻的更不必说了，是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爱国主义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在梦觉方面智商是相当低的。一直到了“十年浩劫”，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拥护这一场浩劫的。西谚说：“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在这期间，我接触到派到学校来“支左”的解放军和工人。原来这都是我膜拜的对象。“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深信不疑，奉行唯谨。可是现在一经接触，逐渐发现他们中有的人政策观念奇低，而且作风霸道，个别的人甚至违法乱纪。我头上仿佛泼上了一盆凉水，顿时清醒过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我是明白的。可是这样的作风竟然发生在我素所崇拜的人身上，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们唯物主义者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花言巧语，文过饰非，是绝对不可取的。尽管我们知识分子身上毛病极多，同别人对比一下，难道我真就算是“臭老九”吗？

我在上面啰哩啰唆讲了一大篇，无非想说，“文革”整知识分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怎样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对广大的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文革”并没有过去。再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说了出来。可是我要问：有这种想法的难道就只有我季羡林一人吗？

这就联系到我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受害者舒愤懑了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回顾过去谈起。解放初期我和其他老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经写了一点，现在再补充一下。补充的主要是从海外归来的游子。远居海外的华侨，亲身感受到解放前后自己处境的剧烈变化。他们深知这一切都与祖国的解放有密不可分的联

系，一向爱国的华侨，现在爱国热情蓬勃激荡，为此前所未有。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他们同国内的知识分子一样，看一切都是红艳如玫瑰，光辉似太阳。愿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此外，一些在国外工作和讲学的中国学人，也纷纷放弃了海外一切优厚的生活和研究条件，万里归来，其中就有后来在“文革”中自沉的老舍先生。他们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认为祖国前程似锦，自己的前途也布满了玫瑰花朵。

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主要借口。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对比何地地鲜明！我亲眼目睹的这种情况可谓多矣。这对我们祖国有多么大的危害，脑筋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会知道的。被迫出国的人，哪一个不是满腔悲愤，再加上满腔离愁，哪一个儿女愿意离开自己的父母！然而他们离开了。

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人，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

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由于每个人都不同的原因，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懑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是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我们不是十分强调安定团结吗？我十分拥护这个提法。没有安定团结，我们的经济很难搞上去，我们的政治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团结，而不是虚假的安定团结。在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还有一肚子气的情况下，真正的安定团结从何而来呢？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尽管许多知识分子的愤懑未舒，物质待遇还只能说是非常菲薄，有时难免说些怪话；但是他们的爱国之心未减，“不用扬鞭自奋蹄”。说这样的人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完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却听说有人听了很不舒服。我最近还听说，有一位颇为著名的人物，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说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是帝国主义皮上的毛。这话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但是，可能性并非没有。说这种话的人，还有一点是非之心吗？还有一点“良知”吗？我深深感到忧虑。

如果这样的人再当政，知识分子无噍类矣。

我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

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如果把这个问题坦率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其中当然包括知识分子，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猗欤休哉！

我们既不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真话总比谎话强。其中有恶意的，怀

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把一池清水搅混。虽然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毕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从？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为止。

我要啰唆的也啰唆完了。

□ 原载《凤凰读书》

~~~~~

### 【痛定思痛】

我做了十年的精神奴隶

· 巴 金 ·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使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十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

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这十年的奴隶生活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写小说的人爱说，有生活跟没有生活大不相同，这倒是真话。从前我对“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这两个词组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写《家》的时候，写老黄妈对觉慧谈话，祷告死去的太太保佑这位少爷，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写鸣凤跟觉慧谈话，觉慧说要同她结婚，鸣凤说不行，太太不会答应，她愿做丫头伺候他一辈子。我想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

在“文革”期间我受批斗的时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有人举出了老黄妈和鸣凤为例，说她们应当站起来造反，我却把她们写成向“阶级敌人”低头效忠的奴隶。过去我也常常翻阅、修改自己的作品，对鸣凤和黄妈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曾看出什么大的问题。

忽然听到这样的批判，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当时只是往牛角尖里钻，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一九七零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想我一直到二十三岁都是靠老家养活，吃饭的钱都是农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一九七零年的我和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已经不相同了。六六年九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

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暗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当时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

但听说马上要交卷，就打起精神，认真汇报自己的思想，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那一段时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宣传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问下去，我只能回答说：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六九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这不是“奴在心者”吗？这和小说里的黄妈不同，和鸣凤不同，她们即使觉悟不“高”，但她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念，黄妈不愿意“住浑水”，鸣凤不肯做冯乐山的小老婆。她们还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们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们并不低头屈服，并不按照高老太爷的逻辑思考。她们相信命运，她们又反抗命运。她们决不像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抗的思想，一点也没有。

我没有提一九六六年。我是六六年八月进“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尔通才能睡几小时。那几个月里我受了多大的折磨，听见捶门声就浑身发抖。但是我一直抱着希望：不会这样对待我吧，对我会从宽吧；这样对我威胁只是一种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拼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这样想：虽然我“有罪”，但几十年的工作中多少总有一点成绩吧。接着来的是十二月。这可怕的十二月！它对于我是沉重的当头一击，它对于萧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敲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来，白天也来。夜深了，我疲劳不堪，还得低声下气，哀求他们早些离开。不说萧珊挨过他们的铜头皮带！这种时候，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从此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弯，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从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東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

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其实我还挖得不深。在那两年中间我虔诚地膜拜神明的时候，我的耳边时时都有一种仁慈的声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就是在入迷的时候，我还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导。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我常常想到黄妈，拿她同我自己比较。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姓袁，我们叫她“袁袁”，我和三哥离开成都前几年中间都是她照料我们。她喜欢我们，我们出川后不久，她就辞工回家了，但常常来探问我们的消息，始终关心我们。一九四一年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

经死亡。我无法打听到她的坟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也不会到她墓前去感谢她的服务和关怀。只有在拿她比较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笔多么深切的爱。她不是奴隶，更不是“奴在心者”。

我在去年写的一则《随想》中讲起那两年在“牛棚”里我跟王西彦同志的分歧。我当时认为自己有大罪，赎罪之法是认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对“造反派”的训话、勒令和决定句句照办。西彦不服，他经常跟监督组的人争论，他认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却认为磨练越是痛苦，对我们的改造越有好处。今天看来我的想法实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却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对“造反派”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动的”作家。可是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逼迫我、也引导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这说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乱，谁也不正确。我说可笑，其实也很可悲。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做“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

到六九年，我看出一些破绽来了：把我们当做奴隶、在我们面前挥舞皮鞭的人其实是空无所有，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许奇怪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写了几十年的书嘛，总还有那么一点“知识”。我现在完全明白四人帮为什么那样仇恨“知识”了。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知识”，也会看出“我”的破绽来。何况是“知识分子”，何况还有文化！“你”有了对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缴械不可。其实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你”服务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须把“你”的“知识”消除干净。

六七、六八年两年中间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就像扫除尘土那样。但是这怎么能办到呢？果然从一九六九年起，我那么一点点“知识”就作怪起来了。迷药的效力逐渐减弱。我自己的思想开始活动。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还有“工宣队”、“军代表”……他们特别爱讲话！他们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上。我的思想在变化，尽管变化很慢，但是在变化，内心在变化。这以后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我开始感觉到做一个“奴在心者”是多么可鄙的事情。

在外表上我没有改变，我仍然低头沉默，“认罪服罪”。可是我无法再用别人的训话思考了。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我吃惊，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灭。我浪费了多么宝贵的时光啊！但是我更加小心谨慎，因为我害怕。当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诚跪拜的时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了虚伪，我的恐怖增加了，爱说假话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无论如何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通过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这种场合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渐渐地脱离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换句话说，我不是服从“道理”，我只是屈服于权势，在武力之下低头，靠说假话过日子。同样是活命哲学，从前是：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们怎样收场！我又记起一九六六年我和萧珊用来互相鼓舞的那句话：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萧珊逝世，我却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编造假话，用假话骗人，也用假话骗了自己，而终于看到假话给人戳穿，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这便是“四人帮”的下场。以“野蛮”征服“文明”、用“无知”战胜“知识”的时代也跟着他们永远地去了。

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

了贼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 摘自《史海钩沉》公众平台

~~~~~

【不堪回首】

“文革”中的苦难史（之一）

• 韩美林 • 冯骥才 •

口述：韩美林

撰文：冯骥才

（本文摘自冯骥才为韩美林撰写的口述史《炼狱·天堂》的上卷：炼狱，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一章 苦难序曲

三、九区十八岗

冯：淮南瓷器厂在什么地方？

韩：合肥以北的八公山的地方，淮南，这个地方俗称九区十八岗，很荒凉，很野。

.....

冯：“文革”一来，你马上被抓了吗？

韩：不是马上。我们淮南这地方偏远，和北京、天津、上海不同步。“文革”初期，我们厂立刻就完全乱了，工人起来造反，没人管事了。我常常被造反派叫去写大字报。反正写毛笔字谁也写不过我。叫我写什么就写什么。那时候有些人不是闹着给自己平反吗？我脑袋里冒出个想法，我也应该给自己平反，这就想到了中央工艺美院的同学蔡小丽，她人很正派，人性也好，对我很了解，她人在杭州，我想找她给我写个证明，证明我是好人。

冯：其实你这个想法很幼稚。

韩：我从来没成熟过，也不想成熟。那时单位没人管，我就买张票跑到杭州找到蔡小丽，把来意一说。她犯难了，不知怎么写，也不知写给谁，我想了想才明白自己并没有想好，我叫人家写什么，怎么写，写给谁呢？这证明根本无法写，只好作罢。不过，这次在杭州叫我看到令人震惊的一幕：批斗盖叫天！我爱看京剧，盖叫天在我心里就是个神。可是这会儿当街正在烧他花花绿绿的戏装，火光浓烟往上冒，盖叫天当时也八十多了，人快不行了，给放在一张藤椅上，呆傻似的仰面而坐，两眼无神，嘴张成一个洞，脑袋剃成阴阳头，半人半鬼，完全没有我心中那个“武松”的形象了。一群造反的红卫兵围在四周狂呼乱喊。这么一个巨人都这样了，天下已经大乱了，到处游街抄家，想想自己，不知道将会有有什么在等待着我。

四、1967年4月7日

冯：我研究过你的各种材料，其实此前你所经历的一切，还只是一种“序曲”与“前奏”。你真正的苦难史应该是从“文革”开始的，对吧，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韩：1967年4月7日。

冯：记得这么清楚。

韩：如果轮到你，这辈子也不会忘。这个日子像刀戳在我心里。

冯：在你从杭州回来后不久吧。

韩：我是接到通知回来的，当时有预感，浑身充满一种不祥的敏感。我去杭州的时候，还特意跑一趟上海看我的母亲。那时我嫂子在医院工作，我说我睡不好觉，找她要安眠药，要了几次，凑上几十片带在身上，准备遇到大难想寻死的时候用，这事后边再说。回来后，听说厂里不少有历史问题的人都挨斗了。连厂长戴岳也给揪出来了。几天后，我跟一个技术员去蔡家岗百货公司买东西。正走在路上，厂里一个运动里闹得挺欢的朱师傅骑车追来，说：

“韩美林，厂里有点事叫你回去。”我边走手里还边用小刀刻着一个木头小人儿呢。我们就扭身返回去。朱师傅骑车一直跟着我，实际是盯着我，这时候我就感觉事情不妙了。

我还没到厂门口，差着八十米吧，就见好大一群人，总有好几百人，像列队一样在门口等着我。我一来，都用眼瞪着我，我一看完了。

冯：请你讲得再细一些。

韩：我下意识把手里的木雕人和刻刀揣在兜里。一群人就拿着杠子上来，噼里啪啦一顿揍，再一踹我就跪下了，然后拿铁丝把胳膊和手拧上了，把我连踢带打弄进厂，到了办公楼的二楼上。刚到楼上，一个厂里出名厉害的，瘦高个子，斗鸡眼儿，守在楼梯口一个耳光把我从二楼扇到一楼，再拽上来，向右拐个弯儿，再左拐个弯儿，进了保卫科办公室，一脚又把我踹得跪在地上，一条杠子把我的腿和脚都压上了，叫我“交代罪行”。这时我一看，保卫科长、军代表、工宣队长都在，就知道今天大难临头了。

冯：你很怕吗？

韩：实话对你说，刚开始怕，后来不怕了。人到这时候了，怕也没用，也不知道怕了。我心想，我的言论该交代都交代了，也不是国民党特务，没干过亏心事。还交代什么呢？专政就专政吧，我就豁出去吧，我说“我都交代了”。身后一个小子，上来就踩压在我腿上的杠子，过去只知道日本鬼子对抓来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员踩杠子，这一踩我才知道踩杠子是什么滋味，浑身从下往上冒凉气，那种凉真是没法形容，而且疼得钻心，汗噼里啪啦下来了。这小子说：“叫你嘴硬，给你再修理一下”，然后用木棍往我脚面死死一戳再用劲一拧，死疼死疼，我脚骨头就碎了。

冯：怎么知道碎了？

韩：很久以后照相才知道，六根骨头碎成四十多块。我疼得大叫：“我操你妈呀！”再想叫想说，嘴不行了，已经充血，说不出来了。他们说：“你跟三家村四条汉子什么关系？跟邓拓什么关系？你给他们画画，你跟他们勾着。”这时我才知道北京中央工艺美院那边又把我一批新的材料转来了。原先认识田汉、夏衍、邓拓算什么问题，他们不都是大作家艺术家吗？谁知道“文革”一来他们是天天写在报上最大的“敌人”！我韩美林上辈子造多大孽，这辈子身上什么东西都能转化为反革命的证据！

冯：这是你的命运，可是——只有我们这代才会有这样的命运。与三家村的邓拓和四条汉子的田汉拴在一起还好得了吗，你可真的在劫难逃了。

韩：我当时想，我在劫难逃了，只有视死如归，横下心用我那破嘴只说一句：“我没什么可交代的。”那小子忽然从桌上笔筒里“刷”地抽出一把锋利的刀，抓起我的手，在我靠近手

腕肌腱的地方扎进去往外猛地一挑，咬着后槽牙说：“我叫你画，你画！”硬把我手上的筋挑了，血冒出来了。这一下，我没感觉疼，只想到我从此不能画了，什么理想、抱负、兴趣全完了，他毁了我！我朝他大骂：“我操你妈！”

我死命往上蹿，他们拿杠子压不住我的腿，拿烟头烫我，把我胳膊用铁丝狠狠倒绑起来。你看看我的手吧，这是挑断筋的地方，这是烫的疤，都还留着。

冯：我不想叫你说下去了！你先别说了……

韩：我想说下去。我这人天生性格太硬。我从来不是软骨头，我什么也不怕的时候更硬。他打你，你愈怂，愈投降，他就愈欺侮你。有人说，就是因为你太硬，挨的揍受的罪才比别人厉害。这话也对。可是，我这性格不就是这么被打出来的吗？

我接着往下说。他们打完我，就拉出去游街示众了。院子里边敲锣打鼓，集合队伍，喊口号，唱革命歌曲。还有一堆挨整的，头戴高帽子，都站在院子里。厂长书记也在里边，还有一个会计，上中学时集体参加过三青团，现在就是历史反革命了。这会计最后是被推到白灰里呛死的，我是亲眼看到的。

他们把压我腿上的杠子撤了，我已经站不起来了，两条腿感觉已经不是我的了。他们把我架下楼，游街就开始了。从厂子东门出去，绕一大圈，再从西门进厂。这时，满街都是游街的。街上的人往我们身上扔石块、石膏、泥巴、煤，还有人上来抽一嘴巴。满身都是扔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鼻子淌血，没有人样了。

我的腿已经木了，两只脚的骨头碎了，一双破皮鞋里全是血，脚肿起来，没法走了，我就把鞋脱掉。我也不知道自己这双脚这两腿怎么走了这么长的路。给我力量的不是人们对我的推推搡搡，而是走在我前边的两个老农民和两个孩子。

冯：你们厂的游街怎么会有农民和孩子？

韩：当时街上不少游街队伍，碰到一起就合到一起。这游街的农民和孩子都是从别的队伍合进来的，合进来就走在我们前边。两个农民一个是卖白菜的，一个是买白菜的，那时农民卖自己的农产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碰巧抓到了就拉进游街的队伍里来。他俩手里各拿着一面锣，前边卖白菜的农民敲一下锣，说一句：“我不该卖白菜。”后边买白菜的农民敲一下锣，说一句：“我不该买白菜。”那两个孩子是土坝子小学的学生，学校叫学生到校外边拾废铁，有一定的数量要求，孩子拾不到，就去工厂偷，每人偷了一根铁棍，叫人抓住了，也推到游街队伍里来。游街时叫这两个孩子背着偷来的铁棍，铁棍有二十多斤重，走长了，快给压得趴下了，腰弯成一个钩，还硬往前一步步走，这两个孩子的形象给了我力量。他们走得了，为什么我走不了。我走过的地方，都有两只脚的血印子。

冯：我无法想象你当时的心情。

韩：可是这时奇迹出现了，就在这当口我的儿子突然出现了。

冯：儿子？你那小狗吗？它怎么会来了？

韩：是呵，它忽然从人群里蹿出来，扑到我身上，两个前爪子亲热地抓我，拉我衣服，从我裤裆下边钻过来，钻过去，用鼻子闻闻我的膝盖，我的腿，好像它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好像它知道我受苦，浑身上下又是土，又是血。我当时已不成人样了，它是怎么认出来的呢？可是就在这时，押着我的那些人轰它，怎么轰也轰不走，还朝他们吼叫，他们火了，挥起杠子打下去，儿子惨叫，几杠子都打在它腰上，下手极重，我猜是打断了脊梁骨。它叫着挤出人群跑了；但是，它的出现给我增添了力量。

冯：什么力量？

韩：情感就是力量。人性也是力量。

冯：可惜这种人性在人身上不存在了，是狗体现出来的。你的儿子的脊梁真的断了吗？

韩：我从此再没见过它。

冯：你知道巴金先生听了你这只狗的故事，被感动了，想起自己爱犬的遭遇，写下他那篇著名的散文《小狗包弟》？

韩：知道。

冯：你后来没有一点它的消息了吗？

韩：有，咱们后边再谈。

冯：此时此刻你的世界里肯定没有艺术了。

韩：你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有一部“作品”。

冯：怎么可能？什么作品？

韩：画。

冯：想象的吧。

韩：不，是画的，我告诉你。游街回来后，我们几个被斗的“牛鬼蛇神”坐在大礼堂前台阶上等着吃饭，饭后还要继续游街。这时，我的皮鞋不是一直提在手里吗？鞋壳里不是灌满了血吗？我忽然发现从鞋尖流出来的血淌在地上，那血的形状有点像个鸡头，我有了绘画的感觉，顺手用鞋尖蘸着血把这只鸡画出来。

冯：这种时候你怎么可能还会去画画，而且是用血去画？能告诉我在那种情境里你从哪里产生的这种艺术行为？

韩：由着本性吧，因为我是画画的。

冯：现实那么残酷，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韩：艺术对于我是听其自然的。

冯：这是什么姿态的鸡？

韩：站立着的，雄鸡，好像是这样吧！

冯：美好的形象吗？

韩：当然，它是我心里的，与这现实无关。

冯：它是美好的，但是用血画的。如果这只鸡还在，那一定是“文革”时期最伟大的作品。它的伟大不亚于毕加索的和平鸽。可是我们无从找到它了。

韩：就在我画这只“血鸡”时，过来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用柳条抽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叫我们喊他们“爸爸”，还踢我们。我们人都快给打烂了，哪里还受得住踢。

冯：那你们怎么办？

韩：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只是他们的恶作剧。再说这并不能怪他们，是那个社会告诉他们我们是坏人。我们只好叫他们“爸爸”，不停地叫他们“爸爸”。

冯：下午继续游街吗？

韩：是，一天下来我们走了十里路，我也不知道自己两条破腿怎么走了这么长的路。游完街，就被送到公安局的看守所。进了看守所，被看守上来一踹跪下，朝我喝叫：“现在宣布，拘留淮南瓷器厂反革命分子韩美林，你签字吧！”我签完字，我们厂里的人就走了，我归公安局管了。警察把绑我的绳子铁丝解了，我的手脚和身上，不是紫的就是黑的，然后被两个警察押着走过院子，进到里边。

进看守所先要登记，然后解下皮带，身上的东西掏出来，工作证，一点钱，还有那木雕人，都交出来；刻刀在游街时掉了。没想到，我在这里被拘押多年，等到出来时，我那条皮带由于沾了不少血，还有汗水，沤湿发霉，全都烂了。

五、九天

冯：你在看守所押了多少天？

韩：九天。

冯：这九天你是怎么度过的，受审讯吗？

韩：没人审讯我，而是一次次被拉出去批斗。

冯：你不是已经被公安局看管了吗，为什么还被拉出去批斗？

韩：我还没有被捕，再说那时已经无法无天，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再说，我已是案板上的肉了，谁都可以剁一刀。

冯：把你拉出去批斗的还是淮南瓷器厂的人吗？

韩：有时是回厂批斗，有时是外单位拉去陪斗。我已是淮南市的批斗明星。想想看，又是反动言论，里通外国，叛国卖国，又是三家村四条汉子的黑帮分子，在淮南哪有我这号的反动人物？有谁能和三家村四条汉子挂上勾？邓拓、田汉、夏衍，全和我有事。揪出我这号人物是多大的成绩？批斗我这号人物多过瘾？听戏还听名角呢。我还一次一次被弄到合肥各大单位批斗。好像现在的“明星走穴”。可是，批斗最厉害的还是淮南瓷器厂。

冯：怎么厉害？

韩：想出最厉害的办法整你。叫我们十几个被批斗的人，分别跪在工厂东西大门的门口。

冯：示众吗？

韩：叫上下班的人往我们身上吐唾沫吐痰。

冯：有人吐吗？

韩：怎么没人吐，唾沫、黏痰，还有人擤鼻涕。吐得满身满脸，黏黏的，厚厚的，太厚了就往下流，简直都成“鼻涕人”、“唾沫人”了。一天下来，人是臭的。

冯：有的人认识你，他们也会往你身上吐唾沫。

韩：吐不吐是对阶级敌人的态度。我韩美林是破鼓乱人捶。可是也有有人性的，扭头过去了。和我一班干活的女工，就故意说话装着没看见我跪在那儿。有个姓黄的女孩，陶瓷学校毕业的，她和我并不熟，不但没啐唾沫，还朝我点了点头。不过这一点，叫我记了一辈子。

冯：虽然人们不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人性的本质和品德参与着“文革”。

韩：批斗我时，造反队用石膏给我写了一块几十斤重的牌子，上边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家村黑爪牙、里通外国的黑特务韩美林”，“韩美林”三个字上边还使红笔打上叉。这块牌子用铁丝挂在我脖子上。牌子重，铁丝勒进肉里；我脚骨还是碎的呢，怎么也站不住，身体一晃，就说我不老实。这时，一个造反队员上来朝我大骂，说要砸烂我，一棒子打下来，把石膏牌砸个粉碎。他就去找块纸板，做块牌子，写上我的罪名，再挂在我脖子上，我就舒服多了。这个造反队员姓方，是从淄博调来的陶瓷工人，我心里明白，他是有意把石膏牌子打碎的，他变个法子救我。

冯：我就用这种法子救了邻居一位老女人，红卫兵用火烧她时，我给她搂头盖顶浇一桶水，说是叫她“清醒清醒自己的罪恶”，实际是把她身上的火浇灭了。这件事，我写进我的“文革”回忆录《无路可逃》里。那时，很少有张志新那样的公开站在“文革”对立面的英雄，一般有良知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同流合污，保持沉默；一是用智慧迂回抵制。这就是“文革”冷峻的现实。

韩：在这些批斗会中有两场给我的印象很特殊。一场在淮南市文工团。那天批斗会的感觉十分特别，文工团都是演员，男女演员都年轻漂亮，喊口号的声音清脆响亮，念批判稿时声音

顿挫有力，很像朗诵。对我的态度也不那么凶。在批判会上，当把我的“黑画”展示给大家时，居然有人还挺欣赏。文工团里有搞美工的，我听见他们在说“画得真不错呵”。我是中央工艺美院的高材生，在淮南这么偏远的地方当然很难看到我们这样水平的画。

冯：你的家在“四清”时不就被抄了吗？怎么还有画？

韩：从“四清”以来，我家被抄了七八次，哪里还有画？是从省公安厅和轻工业厅临时借来的，为了叫群众批判的。公安厅不懂画，认为我画的都是“黑画”，拿来批判就是了，其实都是很好看的装饰画，往这儿一摆，等于给我办展览了。中午吃饭时，一个很漂亮的女演员给我拿来一碗面，里边还放了一些肉。等我回到拘留所，觉得口袋里有东西，掏出来一看，居然是十块钱和二十斤粮票，肯定就是那个女演员偷偷塞在我的口袋里的。如果所有批斗会都开成这样多好。我当时真想淮南文工团再来拉我去斗一次。

冯：你说两次批斗会很特殊，另一次在哪儿？怎么特殊？

韩：是淮南文艺界搞的，这次气氛就完全不同了，很紧张。同时挨批斗的六个人里有淮南文化局的局长。我是反动权威，因为我是从北京调来的。批斗会上一个小伙子蹿得特别高，大声念完“最高指示”之后，就带领全场呼口号，可能他脑袋里的弦绷得太紧了，一下子把“打倒刘少奇”，喊成“打倒毛主席！”顿时全场大乱，出现一个现行反革命，立刻五花大绑把他推上台，说挖出一个“和韩美林一样的现行反革命”。哪是挖出来的，是他自己蹿出来的。

更离奇的是下边，一个主持会的老领导，也紧张起来了，愈怕把话说错愈出错，他竟然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成“千万不要阶级斗争！”当他意识到他把话说反了，犯了大忌时，急得一边哭一边“啪、啪”扇自己耳光。于是又冒出来一个反革命。

我弯腰低头站在台上，心想怎么一连出两个闹剧，莎士比亚也写不出这种戏剧来呀，我噗哧一笑，叫人看见了，他大喊：“我检举，刚才韩美林笑了！”我跟着挨了第三顿揍，但这样荒唐的批斗会也是很稀罕的了。

冯：我想问你，在这一连九天的批斗之后发生了什么？

韩：第九天的批斗会在看守所的门前举行，批斗会结束，我因反革命罪被宣布正式逮捕。这一天对于我，好似在人间与地狱之间划一条界限。我前边遭受的其实还都是人间的苦难，从这天开始才真正经受炼狱的磨难了。

第二章 炼狱正史

一、洞山100号

冯：你被捕是哪一天？

韩：1967年5月8日，这个日子我也不会忘掉，这一天我正式成为炼狱里的一员。

冯：你被关在什么地方？是换一个地方，还是仍在看守所里。

韩：没有动地方，但身份变了。我被捕了，罪名是“反革命分子”。这地方叫洞山100号。

冯：洞山100号在什么地方，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吗？一会儿我是要跟你“进去”的。

韩：淮南不是九区十八岗吗？它在九龙岗和谢家集之间，背靠着八公山，这一带非常荒凉，山上没有什么树，更没有森林，只有土和石头，风一来飞沙走石。枪毙人就在不远的山里。看守所是孤零零、四四方方的一座院子，迎面开一个小口是门，进门是审讯室。这里属于公安，“文革”砸烂公检法时，一度被军管了。院子里全是关押犯人的号子，负责警戒的看守

们住在哪里，我始终不知道。这里的门牌是100号，所以人称洞山100号。这座看守所是市级的。关押的人很杂，有小偷和各种刑事犯，有行刑前的死刑犯。“文革”中一些政治重犯也关在里边；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他做过安徽省省委书记，还有一些大官也都在这里关过。

冯：旁边没有其他建筑吗？

韩：有一座劳改厂，干什么活不知道，它和我们没有关系。西边还有些农民的土房子，也同我们没关系。有时我们被押到看守所外边拔草种地，眼睛不能看别的地方，被盯得很死，怕我们跑了。房子后边有个水塘。

冯：你知道看守所不是监狱吗？看守所关押拘捕后、服刑前的犯人；监狱关押服刑后的犯人。

韩：不知道，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是犯人，会被捕，会关进这里，我感觉这里和监狱没有什么两样。

冯：在宣布你被捕时，你想到什么？

韩：死。或者被枪毙，或者自杀，我不是有几十片安眠药吗？这个我还要放在后边说。

冯：被捕那天，经过什么过程？

韩：谈话。所长在审讯室与我谈话，所长是个女的。名字我不知道。

冯：哦，为什么是女所长？

韩：只听说她在延安时给哪位首长做过保姆，不知道她怎么当上看守所的所长。那时公检法被砸烂，公安系统内部分成两派势不两立，两派都拉她，她左右两条胳膊上就各戴一个造反派的袖章，表示两边都不得罪。她戴着两个袖章的样子有点古怪。

冯：她对你凶吗？

韩：不凶，这出乎我的预料。一年来我遇到的都是如狼似虎，惟有她对我说，你既然进来了，就什么也别想了，少说少问，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

冯：她长什么模样？

韩：比中等个子略高，略胖，模样还顺眼，比较朴实，不爱说话，像农村妇女出身，待人也像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不凶。我们吃的饭她还要拿个勺儿尝一尝，这种情况只有她做所长时有。她这个时候还允许犯人的家属送点钱和日用品，送吃的不行；可以看书，都必须是“革命书”，以后这些全不行了。

冯：她骂过你处罚过你吗？

韩：没有。我进来时，被打得不成人样了。她不叫我劳动，她知道我也干不了，她就责令我去写标语。在监狱里没人能写标语。我是美院高材生，写美术字得心应手。她看待我也与别人不一样，因为在淮南很少有人能和北京的三家村四条汉子有关联的，她看我的眼神也就与众不同，好像还有点“尊重”的意思，没有仇视和鄙视。

冯：好像看待发配到边远地方的要人？

韩：好像有一点儿。

冯：这时候你对洞山100号有地狱的感觉吗？

韩：这时还没有，反而觉得这是一个避难所。这里不会挨打，没有批斗，还有吃的。但这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只是因为所长在这儿的一段时间而已，以后洞山100号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这段时间还有一个人我不会忘记。

冯：什么人？

韩：刚才我说了，洞山100号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落。四边全是号房，就是押人的号子，号子外是一圈廊子，中间围着一个院子，院子是光秃秃的水泥地，寸草不生，冬天冰凉，夏天火烫。南北两边各七间大号房，东西各三间小号房。我的号房是10号，大号房，也只要一丈零八寸宽，迎面只有一个大土坑，上边十二个人，房角放一个大马桶，全屋人拉屎撒尿全在里边，虽然有个盖，但臭气冲天，窗户小，又是四层，一层玻璃，一层栏杆，一层铁网，一层鱼鳞板；鱼鳞板像百叶窗，里边看不见外边，外边的看守可以监视里边。这四层窗子封得死死的，臭气全憋在屋里，散不出去。白天一个挨一个坐在坑上，背靠墙。晚上倒下挤在一起睡觉。新进来的人坐在马桶边，按照先来后到往前排着，前边出去一个，后边往前升一个位子。只有戴着手铐脚镣的死刑犯始终坐在正面一排犯人的中间，怕他活动。

冯：你进来就在马桶旁边了？

韩：是，紧挨着。我一进来，满屋子的犯人都看我。这时坐在中间的一位老人对我说：“你怎么给打成这样，脱下衣服叫我看。”后来知道这个人叫应戴天，国民党中校军医，八十岁了，身体很好，气质也不错，一看就是有修养的人。他不过是个高级医生，可那时沾上了国民党军队，就是“暗藏的特务”。他看看我身上和脚上的伤便说，你的皮肤淤血全黑了，脚骨头也碎了，里边的碎骨头都乱了套，不治就废了。

冯：看守所里没有医生吗？

韩：这个野地方的看守所哪有正式的大夫？只有一点急用药。

冯：是他给你治的伤？

韩：是。他对屋里的犯人们说你们吃饭的筷子就别用了，全给我，谁手里有纸板也全给我。他采用的方法就是简易又有实效的“小夹板”的办法：他先把我的碎骨头整理好，然后用筷子做支撑，拿纸板当托板，固定了起来。他是军医，军医最擅长的就是伤筋动骨的外伤。如果没有他的治疗，我的腿和脚就废了。

冯：手呢？你的手筋不是给挑了不能画画了吗？

韩：手筋没法治，后来自己练好了，这个也回头再说。

冯：你真应该感谢这位应先生，以后你见过他吗？

韩：一年后他就被弄走了，去向不明。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有自尊，稳重，喜欢打太极拳，举手投足都很有样子。

冯：你从小参军，受的教育一定是与国民党水火不相容的，你此时对他还有那种戒备乃至对立的心理吗？

韩：完全没有了。我现在是反革命了，罪过比他还大。我已经被弄得“敌我不分”了，大家都一样了，同样是犯人，也同样是人。

冯：这时你对社会、对你原先的信仰有怀疑了吗？

韩：老实说，已经有了，不过还比较混沌。怀疑肯定是有的，有怀疑是痛苦的。

冯：否认就更痛苦。否定自己的信仰无异于推翻自己，谁也不愿意推翻自己。

韩：比我还悲剧的是那位所长。她自杀了。

冯：为什么？

韩：据说公检法批斗她，说她对犯人施仁政，和阶级敌人穿一条裤子。她受不了了，用刀片抹了脖子，把动脉切断，死了。还有一种说法，说她在延安时的老首长被打倒了。这么一来，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弄不好哪一天也被关进号子来，所以她自我了结了。再详细就不知道了，监狱是不能有任何消息的，听来的事都是半句半句的。

冯：什么时候？转一年吗？

韩：不，就在1967年9月。听到她自杀时，已有一些天了，一直没看到她，原来她已经死了。说心里话，直到现在还有点怀念她，她很无辜。

二、十八层地狱

冯：为什么说所长死后，你才真正进到十八层地狱？你被转押到什么特别的号子里吗？

韩：还是洞山看守所，还在十号牢房。就是因为换了一个所长就全变了。他本来就是这里的头头，砸烂公检法时他离开了一阵子，原来的所长自杀后他又回来了。这个人极其残忍狠毒，他站在你面前，就给你一种威胁。

冯：好，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个人。他是天性残忍，是坏，还是“极左”？“极左”是思想立场上的。

韩：全有，“极左”，狠毒，没有人性，还没文化。

冯：这很重要，没文化使这种人再加上一层野蛮。描述一下他的模样？

韩：瘦高，小眼，眼珠是黄的。

冯：一对黄眼球——我已经有形象的印象了。

韩：他一来，首先吃的东西就全变了。从他来直到四年后我从这里走出去，我始终在他的魔掌里。你根本想象不到我们吃的是什么？菜是烂的，洗都不怎么洗，带着泥、沙子。粮食也就两口就没了。菜汤里什么脏东西都有。

冯：怎么会把这些东西放在菜里？故意的吗？

韩：当然是故意的。所长说我们是阶级敌人。对敌人就得恨，就得狠。我们天天饿得受不了，只有被押到田野里拔草浇菜干活时，才可以吃一顿“野餐”，逮虫子吃。豆虫、蚂蚱、蜻蜓、蛤蟆，没有我们不吃的东西。抓到麻雀扒了皮在水里涮涮就塞进嘴里。你知道那种饥饿是一种什么感觉？

冯：我听张贤亮讲过，从维熙的作品里也写过，现在想听你说。

韩：听到米字就流口水，听到碗响就起鸡皮疙瘩，听到厨房里吹火的电动机嗡嗡响，就感到是一种享受，电动机一停这舒服的感觉就立即没了。一次管理员叫我去给他刻图章。我看墙角扔着半碗剩饭，已经馊了，长一层白毛了。这可是碗救命的饭呵！趁他不在屋里，上去几下就把这碗馊饭全扒到肚里。有的犯人饿极了拾烟头吃。

冯：贤亮说饿得连尊严也不要了。可是孟子说过：“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就是说你用脚踩的食物踢给乞丐，他也不会接受。

韩：那是没有饿到极点。我在刚到洞山那几天，不是常被拉出去批斗吗？有一次批斗回来，押我的人去吃饭，把我锁在自行车的车架上，不给我吃的，我蹲在那里饿得头昏眼花，四周围着一些人看我，像瞧一只动物。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孩子吃包子，只吃馅不吃皮儿，

把包子皮儿扔在地上。包子皮儿很脏，有土有蚂蚁，我上去就抓起来塞进嘴里，那时你还有什么尊严？在洞山，我们那儿有个“吴大爷”，一天管理干部把他拉去提审。管理干部的头头喝醉了，进屋审他时是两个人架他进去的。酒劲一上来，哇地吐了一地，这吴大爷后来对我说他当时实在太饿了，说自己什么也不顾了，厚着脸皮趴在地上，把那一大摊吐的东西……

冯：你先别说了，我真有点受不了了。

韩：洞山不是养着两条狼狗吗？狗吃得都比我们强。我们在放风时，趁他们不注意，狗也不在，就把狗盆子里的狗食全吃了。

冯：我不想再在这个吃的话题上与你谈下去了。

韩：每次说这些事，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是必须说给你，你不是要知道我真实的经历吗？好，咱们说点别的，说说刚刚提到的“吴大爷”，我把他的事讲给你。

冯：我听着——

韩：吴大爷是个贫农，他叫吴化雁，名字的字对不对我不知道。犯人之间是不能讲的，讲就敲断你的指头。他第一天进号子来就趴在炕上不说话，穿一件粗土布偏襟的棉袄，他是因为摔了一个跤进来的，把牙摔得只剩下一个。一个牙没法吃饭，还是叫我们号子里一个小偷用根线拴在这个牙上拽下来，才能用牙花子吃饭的。

冯：摔一个跤怎么会进来呢？

韩：他是从农村到这边矿上来看儿子的。儿子和媳妇都是积极分子，去忠字班学习去了，家里只有他和小孙子。那天元宵节，他煮了元宵，煮好了先敬毛主席。他举着一碗元宵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主席呵，没有您打天下就没我们穷人的今天。我也不会说话，请您吃碗元宵吧。”说着把碗往上一举，身子向前一倾，脚底下不巧有根葱叶一滑，一个跟头栽在地上，碗也飞了。起身一看，一个元宵粘在主席像的眼睛上。他慌了，叫小孙子搬来凳子上去抠。那时印画的纸都很差，元宵又湿，一抠一个洞，把毛主席像的眼睛抠下来了，糟了！正这时候街道代表来通知开会，正好看见吴大爷在抠毛主席像，把眼睛抠成一个洞，就打成反革命，关进来了。那天提审他，判他三年，送他劳改去，他临走时偷偷把这事告诉我，对我哭着说“我家三代贫农呵，怎么会反毛主席呢！”我能说什么呢？他最后把一个吃东西的罐子给了我，里边有几块烂冬瓜，他不舍得吃，也带不走，送给我了。

冯：这样荒谬的事多吗？

韩：还有一个是因为买了毛主席像不好拿，怕摔了，拿绳子绑在自行车的车把上，被抓了。对了，还有一个我们厂的工人，“文革”时赶时髦烧制毛主席像，可是我们厂过去只烧大碗，没烧过瓷像，没经验，瓷土又差，烧出的像常常是歪着的，立不住。这个工人装窑时一边用劲按，一边说“叫你歪！叫你歪！”没想到书记正站在身后边听见了，马上把他抓了起来，说他骂毛主席，反革命罪。关在洞山看守所里的什么人都有，小偷、杀人犯、强奸犯、武斗打死人的，“文革”一来反革命特别多。

冯：都是被判过刑吗？

韩：判了刑就要送去劳改了。

冯：你被判了多少年？

韩：从来没判过，所以一直押在看守所，直到出来，一共四年零七个月。

冯：没判刑能押这么长时间吗？

韩：那时候什么不能？拘留关押没有期限。牛棚里有期限吗？五七干校有期限吗？谁拿我们这些人的命当回事？

冯：都是活着出去的吗？

韩：两种。一种是死在里边的，折腾死的，病死的，有一个小子得了尿毒症，尿不出尿来，叫人也没人理他，憋死了。还有种是死刑。关于死刑我另讲给你……

冯：哎，你为什么不讲话了？

韩：……

冯：好好。我们先换一个话题。咱们说一说你在看守所里的生活吧。号子这么小，冬天怎么取暖？

韩：没有取暖，冬天冻着。但冬天比夏天好过。太冷就互相挤得紧点。天热很难熬。屋里不透风，又有粪桶，又臭又酸，那股子味儿没法描述。

冯：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韩：没有办法，一天天熬。

冯：蚊子一定很多。

韩：你说错了。一个蚊子没有，不仅蚊子，臭虫虱子一律没有。为什么？我们的血不好喝！这也算得上一个奇迹。我们都是皮包骨头，我出狱前，只有七十二斤，两手可以把腰卡起来。

冯：你们不能买东西吗？

韩：谁给你买？再说钱呢？那次在淮南文工团批斗时，那个漂亮的小姑娘搁我兜里十块钱。我求看守帮我买了一支牙膏，每天只用玉米粒那么一点，怕用没了。

冯：你进看守所后，自己的东西一样没带进来吗？

韩：有一天扔给我一个枕头，几件破衣服，是从我厂里要来的，这也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冯：你算得上真正的无产阶级了。这四年多，你们怎么过的年、过的生日？

韩：我们还需要过生日过年吗？我们连日历都搞不清楚，不知道哪月哪天，只是偶尔从远处农村传来的广播里听到过年了国庆了，可是与我们毫不相干。

冯：你们遇到过什么格外的开恩？

韩：那就是洗澡了。一年洗一次。十二平方米的方形水泥池水，放了两尺深的热水，人一下去，身上的硬皮就像鱼鳞那样翘起来。一拨人洗过之后出来，另一拨人进去，不一会水就成奶汤子了。平日没有烧水，这会儿叫热水一蒸，有的人受不住休克了，曾经有个人死在水池边抬走了。我反正不洗，我就在每天早晨洗脸时擦擦身子。洗澡水脏得无法想象，这些犯人什么人都有，身上有什么病也不知道。

冯：犯人比较固定吗？

韩：不，这里是看守所，死刑犯不知什么时候拉出去毙了；小偷可能押一段时间放了；还有临时羁押的，过几天就弄走。谁也不知道谁，谁也不关心谁。偶尔听到一点，什么怪事怪人都有，外边是绝对听不到的。比如一天两个人被押进来，是军人。一个岁数大，一个年轻，年轻的矮矮胖胖，一直在哭。我们没问，他们自己说了才知道，这个年轻的军人还挺有名，曾经从火车道上抱走坏人横在那儿的枕木，抢救了一车人的性命，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和表

扬，后来不知怎么露馅了，原来这事是假的，那枕木是他自己放的。其实别人并不知道，是他受了中央领导接见后，还想再当一次英雄，又搬块大石头放在火车道上，然后装着救火车。可是这次叫火车司机老远就看到了，赶紧把火车停住，拿个铲子跳下车就揍他。他给抓了起来。这事是欺骗中央呵，罪过当然很大。那个岁数大的军人就更糟糕了，他是团长，与勤务兵下棋，连输了几盘，偏偏那个勤务兵得意洋洋，他火气上来，掏出枪一枪把勤务兵毙了。这个团长肯定死罪。那个年轻军人的红领章给扯去了，团长的军装也给扒去了。这两个人在看守所没待上两天就转走了。这种人在外边能听到能碰到吗？送进看守所的都是各种极端的人，还有各种恶人。可是我什么事也没有啊。我没有杀人放火、弄过女人、搞过破坏，对国家、对社会、对任何人从来没做过半点坏事。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可是我找谁说去？

冯：你不甘心？

韩：尽管有时非常绝望，但我不甘心。

冯：也好，不甘心会促使你活下来。

（未完待续）

□ 摘自冯骥才：《炼狱·天堂——韩美林口述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